法　国

2016 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本年度法国学界围绕多个主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风向标的《今日马克思》杂志在 2016 年分别选取了“心理分析：另一种唯物主义”以及“一个全球统治阶级?”两个讨论主题。而从发表的著作来看，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劳动哲学，代表性成果有《马克思与劳动规律：资本的生命政治身体》[①]和《与卡尔·马克思一起思考劳动》[②]；(2）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考，代表性著作有《我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③] 和《发现马克思》[④]；(3）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如《爱因斯坦，马克思与先知穆罕默德》[⑤] 和《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基督教意义》[⑥]；(4）新自由主义研究，如《心理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与权力的新技

① Jacques Bidet，*Marx et la Loi travail: Le corps biopolitique du Capital*，Les Editions sociales（14 novembre 2016）.

② Pierre-Yves Gomez，*Penser le travail avec Karl Marx*，Nouvelle Cité（25 août 2016）.

③ Alain Badiou，*Qu'est-ce que j'entends par marxisme ?: Une conférence donnée le 18 avril 2016 au séminaire Lectures de Marx à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a rue d'Ulm*，Les Editions sociales（20 octobre 2016）.

④ *Découvrir Marx*，Lucien Sève（Postface），Florian Gulli（Commentaires），Jean Quétier（Commentaires），Les Editions sociales（15 septembre 2016）.

⑤ Bachir Ousseini，*Einstein, Marx et le Prophète Mohamed*，Du Net（11 août 2016）.

⑥ Jean Borella，*Marxisme et sens chretien de l'histoire*，Editions L'Harmattan（1 juin 2016）.

术》[1]、《法兰西的新自由主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2]、《市场的颜色：美国的种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3]、《新自由主义：一个宏大叙事》[4]；(5)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如《民主国家的终结：普兰查斯或一种为了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5]、《马克思主义的光与政党的阴影》[6]、《重读革命》[7]；(6) 葛兰西研究，如《葛兰西研究：对资本主义被动革命所做的连续批判》[8]、《意识形态的力量或回到葛兰西》[9]。

在上述研究主题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如《认识与自由：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的社会人类学》[10]、《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思想》[11]、《马克思、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命运与非洲》[12]、《蒲鲁东及其全集》[13] 以及《进化：马克思的证据》[14] 等等。

本报告将通过下面四个部分概述近期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所取得的重

---

① Byung-Chul Han，*Psychopolitique: Le néolibéralisme et les nouvelles techniques de pouvoir*CIRCE（20 octobre 2016）.

② François Denord，*Le néo-libéralisme à la française: Histoire d'une idéologie politique*Agone（10 octobre 2016）.

③ Sylvie Laurent，*La couleur du marché: Racisme et néolibéralisme aux Etats-Unis*Seuil（3 octobre 2016）.

④ Jacques Bidet，*Le néolibéralisme: Un autre grand récit*，Les Prairies Ordinaires（18 mars 2016）.

⑤ Jean-Numa Ducange, Keucheyan Razmig，*La fin de l'Etat démocratique. Nicos Poulantzas, un marxisme pour le XXIe siècle*，PUF（21 septembre 2016）.

⑥ Bernard Foutrier,*La Lumière du marxisme et l'ombre du Parti*, Editions L' Harmattan（1 avril 2016）.

⑦ Jean-Claude Milner, *Relire la Révolution*, Editions Verdier（3 octobre 2016）.

⑧ André Tosel, *Etudier Gramsci: Pour une critique continue de la révolution passive capitaliste*,Editions Kimé（19 mai 2016）.

⑨ *Le pouvoir de l'idéologie ou le retour de Gramsci*/s/dir V. Sirapian/ Sigest; Édition : revue Europe et Orient（4 décembre 2015）.

⑩ Francis Farrugia, *Connaissance et Libération: La socio-anthropologie de Marx, Freud et Marcuse*, Editions L'Harmattan（1 décembre 2016）.

⑪ Nikos Foufas,*La critique de l'aliénation chez le jeune Marx*,Editions L' Harmattan（1 mai 2016）.

⑫ Benjamin Diomand Aikpa,*Marx, la mondialisation, le destin du capitalisme et l'Afrique*, Editions L'Harmattan（1 avril 2016）.

⑬ Eugène Pelletan, *Proudhon et ses œuvres completes*,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5 mars 2016）.

⑭ Suing Guillaume, *Evolution: la Preuve par Marx. Depasser la Légende Noire de Lyssenko* Delga（7 mars 2016）.

要进展。

一、马克思思想中的哲学与政治

米沙埃尔·康特在其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形而上学中对于政治的埋葬》[①] 中认为，在马克思的形而上学中，特别是在其哲学人类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对于他何以既没有发展出一种政治理论，也没有在其社会理论中为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留出足够的理论空间这一问题进行解释的线索。在康特看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同时又将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整合入一种哲学人类学，这是理解马克思与政治问题的关系的关键。康特将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称为类存在物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作为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的综合，无法为解决个体和类的紧张关系留下空间。

让·维乌拉克在题为《马克思之后的哲学》[②] 一文中认为，1845 年之后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哲学，而是通过在历史性的共同体内重新引入对于其基础的追问，以及通过将本体论重塑为一种关于生产的超越性科学而赋予哲学以全新的形式。鉴于“基础”问题曾是形而上学在建立第一推动者时已将其实体化者，马克思对于基础的这种重新追问的独特性应受到足够关注。马克思关于基础问题的重新思考要求我们承认，所有似乎被直接给予人的东西事实上都是人所创造的，而与此同时，这一思考又迫使我们承认，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生产本身就是与哲学家共同体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功能。在维乌拉克看来，马克思不仅克服了胡塞尔所批判的那些哲学家的素朴性，而且克服了哲学的“乏味的空洞性”，迫使哲学不得不直面和探讨全部社会领域以建立理论探讨的基础性的支撑结构，并对自己的社会立场和主体化的特殊方式进行批判，因此马克思之后的哲学已无法再具有像以前那样的形态了，而是普遍对意识形态抱有一种怀疑态度。

安德雷·托塞尔在其文章《在哲学和政治上回到马克思》[③] 中则讨论了马

---

① Michael Quante, «L’enterrement du politique dans la métaphysique de Karl Marx», *Actuel Marx*, n57.

② Jean Vioulac, «La philosophie d'après Marx»，*Actuel Marx*, n57.

③ André Tosel, «Sur un retour de Marx en philosophie et en politique. Éléments de recension bibliographique»，*Actuel Marx*, n59.

克思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在当今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中的研究现状。托塞尔指出，最近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首先是马克思的一些经典作品重新译为法文，有的是重译，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而有的则是根据新的文献进行了翻译，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这些重译工作相应的，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争论以及关于马克思之后的哲学争论。而这些争论就似乎再次回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法国思想界关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后者是由阿尔都塞在 1965 年发表的两本著作以及塞弗（Lucien Sève）的著作所激发的。如果说阿尔都塞的作品的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引介的话，那么作为阿尔都塞的对立面的塞弗要做的则是对前者的工作进行质疑，其著名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哲学?》。在这些“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探讨的还有许多年青一代的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雷诺（Emmanuel Renault）和费什巴赫（Franck Fischbach）。后两者的研究超出了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框架，显示出具有多方面的创造性，并有着新的思考起点，例如，雷诺是通过在实用主义导向下的解释的多元性的阅读方式重新解释马克思，而费什巴赫则试图用新社会哲学将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和范畴进行重构。而就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来说，有一些学者如伽罗（I. Goro）和杜康日（J.N. Ducange）则试图对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二、统治阶级问题

斯提法诺·佩特鲁西阿尼在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的统治阶级概念》[①] 一文中试图探讨与马克思思想中的“统治阶级”概念的内涵以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引起的争论。佩特鲁西阿尼认为，尽管“统治阶级”概念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文本中都是一个核心概念，但其内涵和意义都尚未得到阐明。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阶级”并非由个体的收入水平，也不是由他们的活动方式所决定的，而是由他们与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所决定的，不过在佩特鲁西阿尼看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论述

① Stefano Petruccinani, «Le concept de classe dominante dans la théorie politique marxiste», *Actuel Marx*, n60.

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并不是仅仅从对于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的角度而对统治阶级进行界定，而是将同时在“意识形态—文化”和“国家—政治”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也视为统治阶级之为统治阶级的条件。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都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不过这种附属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在诸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的作品中，马克思明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拥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从而可以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进行运作，因此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也有可能从属于政治权力并经受意识形态霸权的统治。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有可能自主运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谈论的其实就只是一个“管理阶级”（la classe dirigeante），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统治阶级”概念在今天是否仍有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思想家们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回答，不过佩特鲁西阿尼认为，葛兰西关于权力的运作方式的研究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关键性的推进。葛兰西从“强制性”和“一致同意”两个方面理解管理阶级的权力，因此这种权力是一种“霸权”，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种霸权就是兼具“引导性”和“统治性”的权力。除此之外，葛兰西还探讨了这种霸权的形成和加强的方式，认为在“广义的国家”中源自市民社会的私人组织也通过知识分子参与的形式帮助构建管理阶级由以建立其霸权的基础。而正是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出发，阿尔都塞提出了其“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理论。不论对于葛兰西还是阿尔都塞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不能被国家领域的“公共性”和市民社会的“私人性”之间的差别所迷惑。佩特鲁西阿尼指出，当代发展了的现实情境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时代又已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在这个“多元民主”时代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理论，就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者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佩特鲁西阿尼将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的工作视为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尝试。米利班德审视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起点是将经过民众投票选举而具有的政治权力和相对不受选举政治的影响而进行运作的“国家机器”进行区分，前者根本上说仅是形式上的权力，而真正进行“控制”的乃是后者，因而真正控制权力网络的力量其实并不依赖于选举政治。不过佩特鲁西阿尼同时指出，随着世界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国家”兴起，跨国资产阶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比民族国家时代更加复杂，统治阶级和政治机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理论又一次面临着重大挑战，而这

正是比岱（Jacques Bidet）、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和莱维（Dominique Lévy）要求重建统治阶级理论的深层原因。

比岱在其文章《统治阶级的概念：从民族国家到世界国家》[①] 中提出了他对于“统治阶级”概念的“改造方案”。在比岱看来，对统治阶级这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前提，是对民族国家和世界国家进行区分。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中，如果将“统治阶级”理解为“资产阶级”，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既“统治社会”又“管理国家”不同的是，生产和交换的所有者事实上并不必然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因而我们应当关注的，除了在市场中对财产进行掌控的社会力量之外，还应当有组织的推动力量，而这种力量并非仅存在于企业中，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岱一方面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深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理论，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理论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因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引导”，所需要的不仅是压迫性的力量和文化性的力量，还需要管理性的力量，以建立起一个社会“组织”，即把社会建立为一个将各种机构与服务统一在一起的综合体。如果说“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目标在于追逐抽象财富或剩余价值的话，通过“引导”而组织起来的“社会总体”在其各种机制中所追求的则是作为社会合作成果的“具体财富”。比岱就这样将“统治力量”和“管理力量”区分开来。如果说统治力量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话，那么掌握管理力量的则是比岱所称的“权能者”。比岱按照古尔德索普（John Goldthorpe）所提出的标准，将对某种为社会所认可的、旨在管理生产的“社会—技术过程”或对人本身进行照管（如教育、医疗等）的权能（conpétance）予以引导和鉴定的受雇佣者称为权能者（conpétent）。比岱拒绝将权能者视为“中产阶级”，因为“权能者”概念所强调的并非某种“中间”性，而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划分。同时，比岱也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将“高层阶级”划分为了统治者和管理者两部分，因为一方面资本家阶级有其自己的“管理团队”，另一方面“权能者”也参与统治。因此事实上比岱将“统治力量”和“管理力量”视为“统治阶级”的两种具有不同作用形式的社会力量，二者与“被统治阶级”或“大众阶级”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种原初社会力量”。比岱将这种视角下的“统治”称为“结

① Jacques Bidet, «Le concept de classe dominante, de l’État-nation à l’État-monde», Actuel Marx, n60.

构性的统治”，认为对于“统治”和“统治阶级”问题的这种理解能与当代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新变化即“世界国家”的出现适当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世界国家仍然以上述三种力量间的关系作为其基本结构。不过，世界国家中的“世界统治阶级”不再进行管理了，因为“权能者”的认知力量已被资本家的资本力量所控制，也就是说，资本力量已在事实上主导了整个统治阶级。但比岱还认为，正是由于统治力量运用于生产的技术同时将为权能者和大众阶级提供联合的手段，因而资本力量受到这种联合的控制将是世界国家发展的趋势。

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梅尼克·莱维在题为《全世界上层阶级，在帝国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① 的文章中，试图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中讨论统治阶级的问题。在杜梅尼尔和莱维看来，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推动了金融全球化过程，而正是这一过程塑造了当代阶级统治的国际网络。在阶级统治出现的这一变化中，国家力量并未退出，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对这种国际化的统治力量提供保护和强化。杜梅尼尔和莱维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对生产资料的统治和占有的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不能脱离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同时他们认为，这种大背景所体现的：一方面是金融机构的表面扩张，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自身所发生的内在变化。杜梅尼尔和莱维将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发生的根本变化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经营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所谓“经营主义”（cadriste），是指经营者而非所有者在生产中发挥核心作用。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组成统治阶级；而在新的生产方式下，经营者组成新的统治阶级。资本家与经营者被杜梅尼尔和莱维称为“上层阶级”。在金融全球化尚未形成时，金融机构的经营者是作为金融资本家的代理人存在的，并未事实上构成一个阶级，而从资本归大金融公司所有以及管理人员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这两个方面说，此时的生产关系无疑是资本主义的。随着全球金融化形成，资本家与经营者的新自由主义联盟被大众阶级和经营者的社会民主联盟所取代。

威廉姆·罗宾逊在《范式转变的时刻：跨国资本的兴起与关于世界统治阶级的争论》② 一文中提出了改变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和统治阶级的研究范式问题。

---

① Gérard Duménil et Dominique Lévy, «Classe supérieu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sous une bannière impériale!», *Actuel Marx*, n60.

② William I. Robinson, «L’heure d’un changement de paradigme: la montée du capital transnational et le débat sur la classe dominante mondialisée», *Actuel Marx*, n60.

在罗宾逊看来，在以往大多数的相关研究中，“国家中心主义”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使用的核心范式，这一范式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结构的把握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 21 世纪的世界发展了。全球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世界资本主义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其突出表现是跨国资本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应的全球统一生产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建立。而与这些变动同时出现的，是试图将自己的阶级权力运用于“跨国国家机器”之上的“跨国资产阶级”。跨国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型全球统治阶级，不断尝试建立一种全球霸权阵营，以维护该集团自身的统治，而这一集团之外的大部分人则通过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方式被排斥在这一统治之外或被压抑。在这一矛盾之中，全球资本主义遇到了自己的危机。大众反抗正以各种形式、在世界各个角度出现，并对跨国资产阶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

吉乌里奥·阿佐里尼在其文章《论新阶级：资产阶级的，跨国的和统治性的?》[①] 中追问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中权力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给出了多种答案。在阿佐里尼看来，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在《跨国资产阶级》一书中对于跨国资产阶级统治问题的研究最具启发性。阿佐里尼将斯克莱尔的讨论重点归纳为：正是当代跨越国家边界的“跨国实践”而非某种国家行为推动了跨国资产阶级这一新阶级的形成；新阶级的构成要素包括企业要素、国家要素、技术要素和消费要素；新阶级本身具有全球化趋势；新阶级对基础阶级形成统治。阿佐里尼针对斯克莱尔的研究提出四个问题：“全球阶级”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新统治阶级的成员是谁？当前的统治阶级真的能被理解为跨国阶级还是它其实只是“大西洋地区”的统治阶级？跨国资产阶级是一个统治阶级还是一个引导阶级？关于第一个问题，阿佐里尼认为，鉴于全球化过程事实上涉及诸多社会阶级，因而不能将“全球阶级”仅仅理解为“跨国资产阶级”。关于第二个问题，在阿佐里尼看来，斯克莱尔没有将所谓“精英”（即政府官员、职业政治家、国家公务员或国际组织雇员、知识分子等）视为“跨国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而事实上这些精英与资产阶级是无法分离的。关于第三个问题，阿佐里尼指出，当前的“跨国资产阶级”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只能被视为根本上是“西方化”而非“全

① Giulio Azzolini, «Sur la nouvelle classe capitaliste, transnationale et dominante?», *Actuel Marx*, n60.

球化”的新阶级。关于第四个问题，阿佐里尼认为，从目前的跨国资产阶级来看，其主要功能体现为政治—机制引导，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统治，因此更应被理解为一个“引导阶级”而非“统治阶级”。

三、葛兰西研究新进展

罗曼·德桑德尔和让-克劳德·仓卡利尼在《“思想发展的节奏”：意大利葛兰西研究的新进展》[①] 一文中梳理了当今意大利思想界的葛兰西研究的现状。引人注目的是，在该文中德桑德尔和仓卡利尼介绍了“国家版”《葛兰西全集》的出版情况：“国家版”计划于 1990 年开始构想，从 1996 年起开始付诸实施，并已于 2007 年出版了《翻译笔记》两卷。“国家版”《葛兰西全集》的编纂所催生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狱中札记》所做的政治语义学的解读工作。尽管后者并不属于“国家版”编纂工作的一部分，但与这一工作的进展密不可分。部分参与“国家版”编纂工作的学者于2000年10月至2003年7月间在意大利“国际葛兰西协会”举办讨论班，其成果结集出版《葛兰西的语词》（*Le Parole di Gramsci*）一书。讨论班的参加者们感到有必要编一本关于《狱中札记》的小辞典，以在不改动文本、但对文本进行严格的重新阅读的前提下对该著中的概念予以确切而清晰的解释，而这就要对《狱中札记》获得那些“大概念”的“路线图”进行描绘，这就是说，不是把葛兰西的概念视为以一种一蹴而就的方式所获得者，而是将其视为通过若干独特的道路而得到的成果。除此之外，李古奥里（Guido Liguori）和福萨（Pasquale Voza）主编的《葛兰西辞典（1926—1937）》（*Dizionario Gramsciano*）是从政治语义学的角度对葛兰西思想进行解读的另一重要作品。在与“国家版”相关的工作中，一部分意大利学者特别是弗朗西奥尼（G. Francioni）所做的文献学研究对于理解葛兰西思想的重要意义。另外，德桑德尔和仓卡利尼还对新近发现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讨论，在这些文献中，苏联时期的部分档案材料对于理解葛兰西早期的思想历程以及他在狱中与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德桑德尔和仓卡利尼还特别介绍了一些意大利学者将《狱中札记》放在具体政治情景中所做的研究，

① Romain Descendre et Jean-Claude Zancarini, «“Le rythme de la pensée en développement”: Le renouveau des études Gramsciennes en Italie», *Actuel Marx*, n57.

这些工作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葛兰西的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

法比奥·弗洛西尼在文章《霸权：一个谱系学的探讨》[①] 中，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来历和演进进行了梳理。今天人们在谈及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这一《狱中札记》中最重要的和最具现实性的成果时，总是习惯性地将之解释为“复杂”社会中的权力理论，也就是无论从社会的或私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政治的或公共的角度来看都同时处于高度组织化和差异化的社会条件中的权力理论。这种理解产生自 20 世纪 60 年代，它清晰而明了，在今天已经成为许多人所共同接受的看法。弗洛西尼试图对这一理解进行挑战，在他看来，霸权理论是对“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斗争进行的解释。但问题在于，“民主”一词显然无法成为葛兰西著作中的重要概念，因为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目标并不是引导与以专制和缺少“市民社会”为特征的“东方”社会相对立的“西方”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斗争。但在弗洛西尼看来，事实上“民主”问题对于葛兰西来说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身处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的他不得不具体地提出一种从共产主义出发的策略性视野以和法西斯主义对抗。而要说明这个问题，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狱中札记》上，还应考察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之前的作品，这就是说，要考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葛兰西就已经逐渐意识到并着手进行的对于如何在意大利和欧洲的变化了的环境中进行政治斗争所进行的思考。弗洛西尼认为，如果我们将《狱中札记》中所使用的霸权概念的含义理解为“政治斗争和国家生活中的文化优势”的话，那么这一思想事实上在葛兰西入狱之前的写作中就已经形成了，确切地说，在葛兰西将列宁的“霸权”概念（意为“工农联盟”）“翻译”为意大利文并为意大利共产党制定新的策略路线时就已经形成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观点：要基于欧洲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复杂性、通过革命行动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抵抗”；对于面对相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来说，必须建立一个范围更广的斗争阵线，将农民群众整合入自己的阵营。葛兰西注意到，在西欧和中欧国家中开展革命运动愈加困难，而这与复杂的、各部分彼此勾连的上层建筑所形成的强大的阻碍有着直接关系。具体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出现了无产者阶层，还出现了一个上层的工人贵族阶层以及附属于其上的工会官僚机构，而这就使得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出现了一种延缓或组织大众运

① Fabio Frosini，«Hégémonie：une approche génétique»，*Actuel Marx*, n57.

动的复杂局面。而在 1926 年，葛兰西进一步认为，在像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资本主义“外围”国家中，尽管国家力量并不像发达国家那么强大，但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中间阶级”，这个阶级经常通过对无产阶级施加意识形态影响同时影响农民大众的方式引导政治。1924—1926 年，葛兰西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丰富：一方面，关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的来源，葛兰西将之理解为在紧急关头能将被分配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不同领域中的各种要素统一起来的、具有压迫性的国家机器本身；另一方面，葛兰西对工人贵族与“中间阶层”作了区分，后者不再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种对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农民大众具有影响力的自主的政治力量而出现。葛兰西的修正了的“中间阶级”概念的内涵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阶级和农民的联系对于意大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比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要弱，从而前者只有成功控制和统治了农民才能真正掌权，而无产阶级则要为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到农民并将之置于自己的政治引导之下而斗争。《狱中札记》正式提出的“霸权理论”正是这些思考的延续。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葛兰西所面对的是两个问题：（1）葛兰西将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权力体系中引入的某种不连续性的力量；（2）这一力量又使另一些具有长期连续性的因素得以出现。而在这两个视角中，农民大众的政治取向问题都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按照葛兰西的看法，法西斯主义在控制政治权力中心之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将资本主义的全部力量组织在一起，建立起一种更具攻击性和整合性的“自由主义政治”，而这样一来，在大众阶级中就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反动，即庞大的农业人口就开始与上层政治出现分离，而此时小资产阶级就开始趁机与农民阶级建立联系。葛兰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的。葛兰西在 1926 年提出两个新概念：“知识分子阵营”和“作为大众的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阵营”，是相对“农业阵营”而言的，意即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但被农业阵营所抗拒的阵营；而“作为大众的知识分子”，则是指需要在这个阵营引入“某种组织性因素”，尽管前者主要指的是意大利南方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全国的情况，但葛兰西仍然认为，二者具有一种内在张力，而正是这种张力可以被视为意大利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的联系陷于“瘫痪”这一状况的根源。葛兰西由此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发现，社会各阶级统一在一起的关键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分子功能”。不过，如果以此作为

思考的立足点的话，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哪怕是“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就不能再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了。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的功能思考并未取消“决定”概念，但将其移至政治或组织的维度，而在这一维度上，不同层面之间的彼此外在性消失了。如果这一观念可以看做葛兰西所谓“实践哲学”的萌芽的话，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霸权理论”和“实践哲学”是不可分割的。在入狱之前，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及其霸权的讨论还是在由意大利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关系所导致的复杂的权力系统的背景中展开的，因此对他来说，“知识分子霸权”与“无产阶级霸权”总体上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在 1926 年的笔记中，葛兰西体现出将二者统一在一起的倾向。此时他已经意识到，对于瓦解南方的甚至全国的农村社会阵营这一任务来说，共产党与“左翼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对农民施加“霸权”，一个中间性的环节是“民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引入，拓展了葛兰西对于权力问题的分析。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居于从属性地位的条件的存在具有合法性，这不仅体现在文化生产上，更体现在这种文化生产所带来的对于大众所进行的组织上。具有组织功能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已经呼之欲出了：尽管葛兰西是在《狱中札记》第四个笔记本第 38 节提出“霸权”概念的，但随着1929年2月在撰写《狱中札记》之初重新定义了的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霸权”就作为一个阶级通过自己的知识分子而将其他居于从属地位的民众纳入自身的规划之中的能力而隐含在“知识分子”概念中了。通过“霸权”概念的谱系学研究，弗洛西尼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不是《狱中札记》中突然出现的概念，而是以葛兰西被捕之前的思考为基础并作为后者的深化的理论成果。

达尼埃尔·弗朗德吉在题为《在葛兰西对于权力的概念化中的教—学关系和统一性学校》[①] 的文章中，试图探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关于教育问题的思想。在弗朗德吉看来，对于教育的反思在葛兰西的工作中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工作，因为葛兰西所探讨的教育问题其实是一种“教—学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基本的而非唯一的工具即学校是受到葛兰西特别关注的对象。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意大利传统教育中的学校及其方向和功能进行了批判，尤

① Daniel Frandji, «Rapport pédagogique et école unitaire dans la conceptualization gramscienne du pouvoir», *Actuel Marx*, n57.

其是对 1922 年担任墨索里尼教育部长的哲学家杰恩提尔（Giovanni Gentile）的教育改革方案提出了批判，而这些批判旨在提出一种与之相对的“统一性学校”方案。弗朗德吉指出，葛兰西对于教育问题的探讨与葛兰西的总体思想是内在相关的，即与其关于文化、知识分子和霸权等思想直接相关。弗朗德吉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作用理解为与资产阶级的守成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蒙昧主义相对抗，为了和通过掌权而对各从属性群体进行建构，葛兰西之所以谈论教育问题，远非仅仅对这个领域进行说明，而是旨在进一步深化对于权力特别是霸权概念的阐述。弗朗德吉认为，尽管当代读者经常会在葛兰西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中碰到一些含混性的地方，而这些含混性很多是由于我们今天的阅读常常受到各种符号统治理论的强烈影响，不过这些讨论留下了一些将霸权理论和实践哲学联系在一起的线索。在此语境中，统一性学校就被理解为一种使得新型“历史性阵营”得以出现的场所，以及在建构革命规划中通过对“知识分子阵营”进行瓦解而建构起农民大众的凝聚力的机制。因而作为其他文化组织的补充，学校的任务就在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将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并达到特定的道德水准。弗朗德吉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批判的教育社会学”，将葛兰西所讨论的学校中的“教—学关系”理解为权力运作的实践形式，而这种实践形式首先是与葛兰西所理解的“哲学工作”密切关联的。对于葛兰西来说，哲学工作不能被理解为建立自洽概念的个体性的“职业性”工作，相反，哲学应被理解为以改变群众的精神世界和达至历史性的真实之物或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普遍性为目标的“文化斗争”，而作为个体的哲学家的具有历史性的个体性依赖于自身与其所欲改变的文化中心之间的积极关系。这种文化中心支配着哲学家并迫使后者进行连续性的自我批判，从而在此意义上扮演着“教师”的角色。这种“教—学关系”显然隐含着语言和言语的问题。在葛兰西看来，这里的语言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集体名词”，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一种文化或哲学，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作为“积极而具有集体性”的关系解决“自发的”哲学家和“职业的”哲学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文化中心与哲学家的关系可以被称为“观念—权力”关系。弗朗德吉将葛兰西关于教育关系中的“观念—权力”问题的讨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为“教—学关系”的霸权：在这个层次上，葛兰西将所有权力所具有的引导和组织功能都理解为一种教育功能。第二个层次是，上述“教—学关系”并非仅仅在学校中运作，除了学校之外，具有这种权力关系的还有工

会、政党、教堂、行业协会、出版社、图书馆、剧院和电台等。第三个层次是，这种“教—学”是一种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集体工作，在这里教师也是学生，学生也是教师，因而学校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符号暴力”起作用的场所或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是一个通过“教—学”过程“达成共识”的场所，而这样霸权理论就不仅与 M. 韦伯式的和布尔迪厄式的符号统治理论区分开来，而且也同阿尔都塞的相关思想有所区别。弗朗德吉认为，葛兰西之所以提出学校问题，其背景就在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意大利的“霸权危机”和“组织危机”，即统治阶级只掌握纯粹的强制性权力，而失去了其“共识”维度，或者说，只“统治”而不“引导”。在葛兰西那里，“学校问题”只是这种“霸权危机”的一种体现：资产阶级已无法确立其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引导作用，因而作为“组织的具体体现”的学校在工业发展中采取了混乱的形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夺权这一“最病态的现象”。杰恩提尔的学校改革方案的目标是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实现其“整体性的雄心”，即国家应当成为教育的组织者和最高教育者，而教育过程则不应当是实证的和现实的知识的传播过程，而应当是精神的内在统一过程的一个环节，与之相应的教学内容是以绘画、歌唱、民间创作和体力劳动为基础，以激发孩子的“自发性”为主要目标的“发现教学法”。而葛兰西所提出的学校改革方案与杰恩提尔针锋相对：这个方案要求建立面向全体人民、以“新的、广义的而非传统的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文化的建构为目标并将体力劳动能力的发展与智力能力的发展统一在一起的“统一性”公立学校。葛兰西“统一性”学校设想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积极的集体关系”原则，第二个原则是“理论—实践原则”。前者与哲学活动有关，旨在每个人身上发展出尚未分化的一般文化，培养深刻思考、在生活中寻找方向的能力；后者与劳动有关，即培养人们在各种文化有机体中进行具有“统一性”的活动的能力。不过后者其实并非外在于前者的独立原则，而是对于前者的具体化：所有的活动都同时是智力性的活动，因而整全性的教学组织（即哲学教育）能够推动这种实践的实现。在弗朗德吉看来，葛兰西的这一思想触及了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作为“积极的集体劳动”的“教—学关系”，为考察个人介入集体发展的可能性的条件，即对不同社会的各种建设性的文化中介进行改变、调整甚至变革的能力提供了前提。

四、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

卡提亚·热内尔在题为《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论心理分析与社会理论的多众结合方式》[①] 的文章中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的关系史。

热内尔指出，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提出来之后，就有一些思想家致力于将这一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家包括赖希、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或与该学派有密切关系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心理分析一开始就是居于“批判理论”中心的一个问题：霍克海默于 1930 年在社会哲学的框架下所展开的一个跨学科研究规划，就是与弗洛姆的心理分析紧密相连的；而对于阿多尔诺的思想来说，心理分析也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遗产进行的改造工作中占据中心地位；马尔库塞20世纪50年代作品中的心理分析同样有着类似的作用。如果说相对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和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样，或多或少都对心理分析有所批判的话，他们对马克思和心理分析的对话关系的理解却有着很大的差别。热内尔沿用阿多尔诺在 1935 年写给本雅明的信中的说法，将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克思思想与心理分析的结合方式区分为“弗洛姆式”的和“赖希式”的。阿多尔诺本人站在弗洛姆的对立面，将后者视为“新修正主义”，对后者之将家庭作为心理学和社会的中介予以批评，认为能胜任这一中介的应是商品和拜物教。热内尔认为，在这里体现了一种对立，即把家庭视为一种国家的“权力之镜”及其权威的永久载体的观点与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意识与无意识间的对立予以打破这一立场之间的对立，而这体现了对于马克思的两种解读方式或两种历史观念。

不过，热内尔对法兰克福学派与心理分析的关系史所做的梳理表明，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历程中，思想家们对于弗洛姆的“新修正主义”的态度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而这是由心理分析对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所决定的。事实上，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开始，霍克海默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与作为弗洛伊德的

---

① Katia Genel, «École de Francfort et Freudo-Marxisme : Sur la Pluralité des Articulations entre psychanalyse et théorie de la société», *Actuel Marx*, n59.

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洛姆之间的思想合作，就是基于对心理分析的共同的批判性理解。在阿多尔诺的影响下，霍克海默重新评价了弗洛伊德的欲望理论，从这一理论之客观地体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家庭的衰落”来理解其意义；而弗洛姆同样也与弗洛伊德关于冲动的升华和压抑等理论拉开距离，他对当代社会中自由所引起的焦虑以及在此问题上个人和集体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追问。弗洛姆拒绝将个体视为本质性的社会的对立面，而是试图探讨现代人的结构特征，即探讨社会进程中的心理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以厘清人走向其自由的、给予其敌人以专制权力反面的原因。对于弗洛姆来说，心理学的关键问题在于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特殊联系方式问题，而非自我的本能需求的满足或剥夺问题，因此他着力讨论的是个体的社会化进程。由于弗洛姆的着眼点仍在于马克思式的“改变世界的可能性”问题，因而他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因此问题在于对“人的要素”及其内在的活力进行分析，为塑造人的新的特性做准备。

对弗洛姆的这种“新修正主义”进行严厉批评的阿多尔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就曾将对于心理分析的理解运用于自己对康德的先验哲学进行的分析中（无意识内在于理性中却不会产生非理性内容），随后又将心理分析运用于对于现实的“阐释”中，而这种“阐释”是通过弗洛伊德的方式加以界定的，即并非通过某种主体性的方式对现实进行说明，而是通过符号去把握现实中潜在的意义，即通过形象的建构、摧毁源自现实中诸孤立要素的图像而把握现实中的非意向性内容。从这一立场出发，阿多尔诺反对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社会学化”的倾向，而认为应当将弗洛伊德视为一个思考个体以实现对社会现实进行恰当批判的思想家。

在阿多尔诺看来，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正是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劳动的精神分工”使个人成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物这一事实，即存在者们被不可逾越的深渊所分裂和原子化这一事实，因此心理分析将导致对于自己所提出的概念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将揭示，弗洛姆所强调的人的特性，其实是经验世界中将遵从规则的无意识现象的本质性和某一特定社会的某种产品的历史性结合起来的物化过程的产物，是个体所遭受的一系列痛苦和打击的结果，而这一揭示将使得一种对于“戕害生命”的社会过程的批判得以可能。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这一问题上赞同阿多尔诺。例如，马尔库塞也认为，弗洛伊德的“个体”概念内在包含着一种具有击碎物化的可能性的“社会理论”，而当弗洛姆在一

种“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时，就失去了其批判性力量；不仅如此，马尔库塞也像阿多尔诺那样，对弗洛姆的“新修正主义”之将现实文化中的“人的潜能”之展现作为目标进行了批判。

但从哈贝马斯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弗洛姆的“新修正主义”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中的理性理论和《否定辩证法》的主题总体上持批评态度，他不仅肯定而且延续了弗洛姆的“新修正主义”。哈贝马斯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解释为变形了的和受到压抑的、并且可以通过意识加以矫正的交往，认为弗洛伊德在解释残缺和变形的文本时发现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而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术领袖的霍耐特则延续了哈贝马斯对待“新修正主义”的态度。对于霍耐特来说，心理分析具有一种解释性力量，同时也具有一种规范性力量，从中既可以生发出一种主体性理论，也可以产生一种充分的社会化理论。霍耐特沿用了弗洛姆的术语，将作为心理结构的人的性格视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按照霍耐特的说法，心理分析所要做的，并不仅仅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忽视的内容，而主要在于建立一种主体性理论，这一理论并不将主体的理性力量作为自己的前设，而是为无意识联系的力量腾出地盘，以便使人类避免演员的意识、融合的欲望和服从的幻觉。

热内尔在认同霍耐特的这种说法的同时，认为心理分析还揭示了社会的不合理方面以及历史中的消极或悖理之处，而这些问题将引导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身的框架进行追问。热内尔认为，梳理法兰克福学派与心理分析的关系史的意义，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接受“文化之病”的视角，同时又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解放之维”，而这也正是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对待弗洛姆的“新修正主义”的态度变化的重要着眼点。在他看来，当代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问题上出现的态度变化，并非仅仅是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该学派的思想家们对于当代社会所出现的新变化进行审视的结果。

艾蒂安·巴里巴尔在其文章《文辞争讼与最终效力》[①] 中探讨了心理分析中的“争讼”（instance）概念。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拉康和阿尔都塞在其著作中都曾使用过“instance”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法

① Étienne Balibar, «L’instance de la letter et la dernière instance», *Actuel Marx*，n59.

国哲学中所谓“结构主义时刻”的标志，对于二者的共同的学生们产生了强烈影响。但巴里巴尔指出，由于这个法语概念所指涉的是一个由“行动”、“要求”、“坚持”、“效力”、“层级”等含义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因此在这一概念的翻译中，特别是在英文的翻译中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巴里巴尔认为，拉康是在发表于 1957 年的《无意识中的文辞争讼与弗洛伊德以后的理性》（«*L'instance de la letter dans l'inconscient et la raison depuis Freud*»）一文中首次使用“instance”一词的①，在那里拉康主要谈的是“instance du significant”（“能指的争讼”）。在英文译本中这个概念被译为“agency”，这一翻译所强调的显然是“文辞”在建立主体于其中进行无意识的思考的空间时所包含的效力或力量，而忽视了该词所暗含的思想和符号都必须向其臣服的、凸显了欲望的不可毁灭性的“重复之强制”的对于“能指链”的“坚持”这一观念。在巴里巴尔看来，这种误译显然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恰当理解拉康的“instance”概念造成了障碍。而对于阿尔都塞来讲同样如此。阿尔都塞发表于 1962 年的文章《矛盾与多元决定》（后收入《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instance”一词被英文版译者直接译为英文的“instance”，巴里巴尔认为这一译法显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英文中 instance 的基本含义是“情况”，但阿尔都塞的原文“dernière instance”（归根结底）中的“instance”是在其援引自拉康思想、但经过改造的“多元决定论”语境中对于恩格斯的“经济因素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这一判断的改述，这一改述所要强调的恰好是，诸如意识形态这样的上层建筑是不能被“还原”为经济基础的，后者仅从因果性的角度来看具有“优先性”，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是功能性的“效力”，而非黑格尔的“最终环节”意义上的“情况”。

巴里巴尔指出，这一点在《读〈资本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阿尔都塞在该著中进一步将“因果性”概念发展为“结构因果性”，从而“dernière instance”（最终效力）意味着“对效力或效力的痕迹进行分配”。在巴里巴尔看来，英译者对于拉康和阿尔都塞对于“instance”一词的翻译都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在于未能在二者的思想大背景中理解这个概念。拉康所使用的这一概念无疑来自弗洛伊德，但其基本用法受到来自索绪尔语言学的强烈影响，所指向的是“如语言般具有结构”的无意识。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关键在于通过将马

① 但巴里巴尔显然搞错了，因为事实上拉康至少在 1953 年就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了，如在其《罗马报告》中就出现了“instance”一词。

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范畴特别是“矛盾”概念运用于弗洛伊德所带来的解释框架而对之进行改造。巴里巴尔从词源学上分析了该词的本义与当代英语、法语和德语中各对应词的用法，认为尽管存在着种种变化和差别，但该词所表达的核心观念始终是“站在法庭前一再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产生了或多或少无法改变的效果”。在巴里巴尔看来，拉康和阿尔都塞对于“instance”一词的不同使用，是对于弗洛伊德著作中多义的“Instanz”一词的不同方向的借用。按照巴里巴尔的考察，弗洛伊德对“Instanz”一词的使用分为两个阶段：从《释梦》到30年代初，弗洛伊德在“审查”的意义上使用该词，意指欲望的表现（例如，梦）所受到的以“同意”或“禁止”为目标的审视，或者“自我”所受到的以内部评判或惩罚为目标的“分割”；而从1931年的《心理分析新论》开始，弗洛伊德改变了对该词的用法，使该词成为同时包含“代理人”和“挑战”两层含义的矛盾统一体，即“自我”发现自己处于来自多方的不同要求之下，一方面是来自“本我”的欲望之满足的无限要求，另一方面是由“超我”所表达的道德要求或对力比多的抑制。巴里巴尔认为，拉康和阿尔都塞分别从“冲突”和“结构”的角度借用了弗洛伊德的“Instanz”，看似方向相悖，却为他们的学生们将“instance”的两层含义重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阿尔都塞那里，特别是在弗洛伊德的“多元决定”的观念影响下，与结构性力量有关的各种“instance”，能够内在地既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斗争”相关也与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力量关系”相关，从而能够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框架的支撑点。

纪尧姆·西贝尔坦-布朗在《一门面对法西斯主义神话的“性科学”》[①] 一文中，试图重新反思赖希的著作《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赖希的这一著作是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遇的最初成果之一，而其背景则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西贝尔坦-布朗看来，该书所体现出的两大思潮的对话，不仅体现了赖希看到二者彼此弥补对方理论“盲区”的可能性，更体现出赖希希望通过融合二者的概念体系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提供思想武器的现实关怀。西贝尔坦-布朗同意巴里巴尔的说法，认为赖希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心理分析在特殊的历史现实中的自我改造，即在现实权力运作方式不

① Guillaume Sibertin-Blanc, «Une Scientia sexualis face à la mystique fasciste», *Actuel Marx*, n59.

仅与心理分析的理论，特别是其关于无意识的话语不相一致，甚至出现了一种操纵和利用无意识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的理论转向；同时赖希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性，即说明了何以在那个时代贫困化的工人并没有生成革命的阶级意识，反倒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对于赖希来说，要讨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问题，首先要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中的观念论”划清界限，也就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如下教条：将群众对于自身的利益的意识或对于被等同于产生意识形态或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提的、作为生产与交换的结构的社会关系的生存条件的意识直接与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能力联系在一起。而这就意味着，在赖希那里，意识形态要素从一开始就被思考为一种异质性内容，即不是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经济理性的表达或由这种理性所规定的利益的表达，而是将之理解为其非理性的他者，而理性在这一非理性领域中推动了阶级斗争，并试图将之理性化。按照赖希的看法，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对一种意识形态之成为物质性的力量的动力进行分析，而正是这种力量使得群众运动和阶级条件之间产生距离，因而资本主义机制无法被划归为某一个阶级如资产阶级的意志所掌控的工具，需要做的工作乃是对主体性的超个体形式的物质化过程进行分析。

西贝尔坦-布朗强调，赖希所探讨的并非抽象的“异质性”或“非理性”，而是具体的、由法西斯主义所推动的关于自然和生命的意识形态，即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综合。关于国家主义，赖希的看法是，“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与贫困群众之间的一致性”不在于将家庭中的专制情感移向继承了“全能父权”特征的另一个形象，而在于将父亲的权威与母亲的身体结合在一起，而这就是“属于自己的祖国”这种“神秘情感”。而种族主义则是这种国家主义的另一面：“德国母亲”是家庭生活的保卫者，是引导民族走向其顶点的力量之源，但她却总是受到犹太人的侵犯……这样，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就内在地统一在一起。赖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体现在，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承担着在专制性结构之外实现解放这一使命的无产阶级的性经验问题。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固然会有一部分人接受资产阶级的性道德，而进入“资产阶级化”的过程，但还是会有另一部分人坚持群众的性经验和性风尚，而正是这种坚持，对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秩序形成了“致命威胁”。赖希的这些观点显然涉及后来福柯所详述的“生命政治”问题，不过福柯在其《性经验史》中事实上对赖希的自然主义总体上持批评态度：福柯一方面批评赖希将性压抑归结

为某种社会机制，另一方面批评赖希为性设定了某种作为法则的主导性力量。而这样福柯就将赖希的工作归结为一种新的“性科学”话语的建构。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学基础进行的反思中，并非只有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一条道路，而且还有巴塔耶的《法西斯主义心理学结构》一书所代表的不同于赖希的另一条思考路径的话，那么福柯显然对巴塔耶的讨论更加倾心。西贝尔坦-布朗为赖希进行了辩护，认为赖希的“自然主义”表述根本上来说应当被视为一种“叙述策略”，其所揭示的“规范”其实只是“反常的规范”，其根本落脚点在于培育新型的性主体，而这也正是赖希晚年所从事的主要事业，因此赖希的工作与福柯和巴塔耶的方向并不形成冲突，而毋宁说根本上是一致的。

乌尔亚·本图阿密在题为《性的辩证化：性别研究中的唯物主义的和心理分析的探讨》[①] 的文章中，通过对朱迪特·巴特勒和西蒙·德·波伏娃等女性主义者的著作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在性别研究中将性“辩证化”的趋势，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重建唯物主义和深化“性的社会关系”的无意识理论的尝试。在本图阿密看来，将性问题辩证化就意味着将心理分析的成果进行政治化意义上的历史化处理，而这也就意味着要反过来对这种概念的生产的抽象化和去背景化进行批判。本图阿密关于“性的辩证化”的观念来自菲尔斯顿（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一书，在该书中所谓“性的辩证法”被解释为“性的去自然化”，即解构性的自然差别，在菲尔斯顿那里，就是在社会关系的变动这一视域中理解性别差别问题。在本图阿密看来，菲尔斯顿所做的工作其实只是她所揭示的“性的辩证法”这一趋势的一个方面，而巴特勒和波伏娃的研究则揭示了其另外两个方面。对于巴特勒来说，人们会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霸权规范予以肯定，这种肯定是与对于性与性经验的二元分野的混乱状况的无意识否定相应的，这种肯定性的话语实践本身就可以同时具有某种颠覆形式。在一种行为范式中颠覆这种范式之所以是可能的，是由于上述话语实践在给定的历史背景中总是会表现为某种“重复性行为”，它一方面成为沉淀于集体意识中的应受指责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被谈论、被提及和被“呼召”中进行自我言说从而抹平伤痕、消除侮辱，因而人就有可能通过自我肯定的政

① Hourya Bentouhami, «Dialectiser le sexe. Réélaborations materialists et psychanalystes dans lès approaches de genre», *Actuel Marx*，n59.

治环节完成集体心理重塑，从而颠覆统治性范式、实现“辩证回归”。

而对于波伏娃来说，性的辩证法更体现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波伏娃所理解的“社会关系”概念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但同时又有着明显的心理分析学的痕迹，例如，在谈到女人所受到的压迫时，她认为不能像恩格斯所做的那样将这种压迫仅仅归因于私有财产，而是应将通过工具进行的占有放在一种“欲望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来理解。而波伏娃之提及“欲望本体论”也不意味着她要“回到弗洛伊德”，相反，她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着较多批评，这些批评的基本点在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忽视了人与他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维度。正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的强调，波伏娃认为女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力量，其作用类似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无产阶级。本图阿密认为波伏娃的理论更能揭示“性的辩证法”的内在力量，但同时也有着明显的缺陷，特别是，由于波伏娃忽视了阶级与生物学的关系，因此她在当代种族问题中的性别关系问题面前保持沉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